

留日学生与 清末新政

■ 鹄湖学术丛书

江西学术，椎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駟，壁立万仞之势，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迨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业，以续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亲约朱、陆等会于鹅山鹄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鹄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鹄湖书院志》



尚小明 / 著

尚小明 / 著

■ 鹅湖学术丛书

留日学生与

清末新政

革命与改革并行，是清末最后十年

的时代特点。留日学生群体作为这一时代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在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共同目标下选择不同的政治道路。忽视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尚小明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3. 9

(鹅湖学术丛书; 3)

ISBN 7 - 5392 - 3843 - 7

I. 留... II. 尚... III. 留学生, 留日 - 关系 - 政治
改革 - 中国 - 清后期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223 号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

LIURI XUESHENG YU QINGMO XINZHENG

尚小明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封面印刷:江西新华印刷厂

内文印装: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2003年9月第2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180千字

ISBN 7 - 5392 - 3843 - 7/Z·120 定价:21.00元

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40号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6705667

URL: <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编辑人语

江右学术，椎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驹、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缙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1175)，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在学术图书出版叠床架屋之今日，要为自己操持的一套深度原创性学术专著取一个满意的丛书名称，着实费了我们几个愚钝的编书匠不少心思。某秋日，陪学界同道至铅山鹅湖书院寻踪朝圣，于习习秋风中目睹“斯文宗主”、“圣域贤关”诸多旧墨遗痕，不

禁感怀寄意,遥念起八百余年前极一时之盛的“鹅湖之会”,朱、陆辩难论诤之情形,依旧令人景行行止,温情与敬意填塞胸臆。蓦然间我们发觉:还有什么比用“鹅湖”来命名它更为合适的了?!

朱、陆所生活之宋代,乃中国文化之重要转折期与特出鼎盛期。陈寅恪先生曾推许:“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而作为宋代文化中心之一的江西,时人亦多有“人才之盛,甲于天下”、“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之美誉。在此时空交结点上出现的鹅湖学术盛会,并非横空出世之偶然事件,而实崭露出一个思想活跃、诸说并起之学术繁兴时代,昭示着一处文化中心区域人文蔚郁、群星璀璨之阔大气象。作为一家地方出版社,我们从不以地域自囿,从不因地处边缘自惭,而一向努力追求胸怀中华文心学脉、放眼天下学术图景以尽当代出版人一己之学术文化担当;况且沾溉于如此悠远之地域文化资源,沐浴于千年不绝之流风遗韵,我们无法不油然对这份赐福深怀感激,并常萌生将其继往开来、光大发扬之念想。“鹅湖学术丛书”之所以能够问世,与这种历史深处的人文底蕴时时在催促着我们戮力勤勉是分不开的。

要进一步说,我们坦言,以“鹅湖”为一学术丛书命名,还有深意存焉。在今天的各类辞典及史论著述里,“鹅湖之会”被简单地定义为朱熹之客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之争。事实上,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内容与精神,远比历史的描述与记录丰富、深远得多。朱陆之异,首在为学工夫。朱熹指陆九渊的“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是近于禅学,所谓“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而主张以“道问学”为重;而陆九渊则责朱熹的“即物穷理”是“留情传注”、“增疣益赘”,所谓“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而力辩以“尊德性”为先。这种学术分野,与当代学界近年的“思想”与“学术”之争,颇有异代同调、契合暗通之处,堪引以廓清今日之喧嚣与迷茫。鹅湖数日,朱陆双方细参异同,各抒己见,反复讲论,

但最终彼此存异,不合而罢。此后两家门人,各有所宗且互竞争雄,恰如两水分流,双峰并峙,在思想史上流衍、弘大为程朱与陆王二大学派。而双方于此颉颃互异之中,又不乏同情理解之心:朱熹晚年颇悔其支离训诂之失,而陆子不久亦有自责“粗心浮气”之语。所谓学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而又有克己之勇与服善之诚,此诚学人戒偏戒执之至道和现代学术精神之首端要义,与当代学人所谓“于己理论彻底而于人学术宽容”一说,不亦有精神相通之处乎?至于其他,如古代士子问道游艺四方的良好风习、于民间书院中接“学术地气”而使个体元气酣畅之追求、讨论天理心性之类形而上问题所体现出的自由与想像、学术对手相互切磋砥砺的进学之道、“志同道合,极论无猜,降心从善”的学术胸襟等等,凡此“鹅湖之会”中所荷载之种种,皆为值得我们今天弘扬推重之优秀学术传统。由其光大的古代学术会讲制度,在近现代发展为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成为推动学术与时俱进的重要方式与动力。但其中至为重要者乃在于,“鹅湖之会”所蕴含的学术精神,无疑有望成为促进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历史资源与一剂针石良药。质言之,“鹅湖之会”之所以被定格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会和一段流传千古的士林佳话,并非因为其所具论百世不易,而乃因其藉争鸣以激荡思想、繁荣学术之优良传统为百世不可易者。逝者如斯——“鹅湖之会”早已超越了其具体论题,而逐渐凸显出其象征之意义:它所孕育的良好学术机制和所倡导的自由学术空气,在当代学术发展中日益体现出其不可或缺之重要性。拒斥异见,则必流于武断塞蔽,终使学术枯萎衰竭;众说争鸣,有望走向宽容多元,终使学术健康昌明。这一事关学术发展的“元问题”,与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学术规范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机制问题、学术“本土化”问题、“中国话语”问题等等,在时下复杂的学术语境中有着一种发人警省、促人深思之历史一现

实关联性。所谓“赋新思于旧事”，“鹅湖学术丛书”接续于历史久远厚重的人文传统，而着眼于现实坚韧有力的学术建设，并深深期许于未来别开新局之文化前景。作为当代出版人，此等高远标杆，虽或有不能至者，但始终心向往之。

近十年以降，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思想学术的“引进—模仿”色彩逐渐淡出，而“创造—参与”之追求日益凸显。历80年代之激越蹈厉、90年代之沉潜蕴积并经跨世纪苍茫心绪之过滤淘洗，中国学术正借全社会创新之主旋律而深入精进。新世纪清明宽阔的学术舞台，正期待着当代学术中坚毅担当、践履自任。“鹅湖学术丛书”试图在此推波助澜，激荡风气，以促成新世纪中华学术之“预流”。在这个大的出版宗旨之下，我们并不想从学科内容上为丛书划定绝对明显的范围——如果一定要说有所限制，那我们想可以概括为偏重于人文而扩大至整个社会科学；而从特质上说则不妨特意提出学术原创、中国话语、问题意识“三原则”，以此有别于充斥坊间之整理汇编类图书、简单译介类图书等，超越于重复堆垛而毫无新创之泡沫学术。

上承八百年前“鹅湖之会”学术民主之精神，适逢中国学术迈向繁荣新创之盛世，“鹅湖学术丛书”贯通历史当今，占尽天时地利，吾等编辑于此深感大幸，同时更觉有重责。志在学术之心意殷切，而常恨个人力气之绵薄，深恐有负士林学界之厚望，由此尤望天下学人同道乐于成人和之美，秉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公心，共襄此旨在提升中国当代学术人文境界之善举，庶几可望构筑一当代学术之“公共空间”。

聊作以上赘语，以为启动“鹅湖学术丛书”之开场锣鼓。

国功 景琳

二〇〇一年五月

自序

我研究晚清留日学生,是从十年前在北大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时开始的。其时,学界对清廷的留学政策、留日学生派遣情况、留日学生与中日文化交流、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等等,已有许多研究。但难以令人满意的是,在研究者笔下,留日学生几乎成了革命党的代名词。私意以为,留日学生与革命运动的密切关系不容否认,但将其笼统地视为革命党,则不全符合历史的实际。研究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正是出乎此意。

十年来,关于晚清留日学生的研究,又有不少论著问世。然而无论是新史料的发掘利用,还是新问题的探讨,依然难以令人满意。开卷所睹,多为大同小异之事实;而议论分析,亦不免时或流于空疏雷同。故此册撰写虽历时十年,但宗旨始终如一:多讲事实,少发议论;多讲往日研究者未讲之事实,少发往日研究者已发之议论。达此目的甚属不易,此册之撰,不过尽我所能而已。至于高深之研究,精辟之分析,就留待同好诸君吧。

尚小明

2002年7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绪 论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 20 世纪的时候,饱受欺凌的中国人依然没有迎来新世纪的曙光。古老的北京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下,又一次上演了四十年前英法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悲剧。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慈禧太后和她的王公大臣仓皇逃往西安。随后,《辛丑条约》就像一根绞索,无情地套到了中国人的脖子上。空前的民族危机激起更广泛、更深刻的民众反抗运动,曾被“举国舆论”目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的革命党人,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支持。^①慈禧太后和那些王公大臣,毫无疑问感受到、也意识到了统治形势的严峻,意识到舍改弦更张一途外,无他法以维持其统治。于是,1901 年 1 月 29 日,尚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正式下达了改革谕旨。谕旨云:

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

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②

这道被梅里贝斯·卡梅伦(Meribeth Cameron)称之为“改革运动宪章”^③的谕旨的颁布,标志着清末新政正式拉开了帷幕。

4月,谕旨又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推行新政的最高政务机构,并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以及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著遥为参预”^④。

新的变革需要新的人才,科举时代日日埋首四书五经的传统士子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培养人才成为规划和实施新政的当务之急,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无疑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实际上,1898年,张之洞就曾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以日本为例,指出培养留学人才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他说: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⑤

作为当时朝廷第一重臣,张之洞的言行动辄为人奉为圭臬,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革新图强的新形势,更是大大增加了张氏之言的分量。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等人,亦大力鼓吹留学日本的必要与方便。于是,从1896年开始的留日运动,在进入20世纪后,逐渐出现高潮,东渡日本的学子或官费,或公费,或自费,络绎于途。^⑥在大约十年的时间内,至少有五万中国人在日本接受了各种程度、各种类别的教育。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革命与改革并行的时代。当清廷下诏宣布实施新政的时候,革命党人的力量已在逐步壮大。大批青

年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负笈海外的。而革命派在海外的活动中心——东京和横滨等地,正是留日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有相当多的留日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甚至成为革命派的中坚。满族大员端方曾通过在国内的“明访暗查”,向清廷报告说,革命党影响非常之大,“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愈数万……所至欢迎,争先恐后”^⑦。1908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在一封致埃塞尔·贝尔的信中也写到:“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回国之后,几乎无例外地都成了革命者。”^⑧毫无疑问,这些记述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际情况,但又不免有夸大之嫌。这种夸大对端方等清廷官员来说,是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而对莫理循等西方人来说,则是出于对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的敌视,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的排外宣传活动”,“大多是由这批学生煽动起来的”^⑨。

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忽视下面的事实(实际上常被有意无意忽视),那就是:在留学界中,为数不少的留日学生,并不赞同暴力革命,而是希望走和平变革的道路。他们“主张君主立宪”,“想改革中国政治、教育、军事”^⑩,以改变中国被西方列强欺凌的地位,求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强盛。这样的思想主张,在清末留日学生当中始终存在着,并且具有相当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留日学界的改革主张,实际上是戊戌维新以来改革思想延续和影响的结果。戊戌时期,康梁的变革主张得到广泛宣传,“所谓士大夫读书阶级,差不多完全是康梁维新派的地盘基础”^⑪。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国内的地盘完全丧失,不得不向海外发展。当康梁亡命日本之时,正是中国留学生纷纷东渡之际,他们当中有一些曾经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或曾受到过康梁改良思想的熏陶。梁启超到日本后,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以“常带感情”的笔锋、平易畅达的文字,继续从事新思想、新学说的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

4

介绍和改良思想的宣传,给留日学生以很大影响。在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十余年间,始终有一批主张渐进改良的留日学生围绕在他的周围,如1907年政闻社在日本东京成立时,“会员约一千五百人,均系留学生”^⑩。

其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相当一部分留日学生发生了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不过是一个“蕞尔岛国”。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均以日本获胜而告终的事实,给了中国人强烈的震撼。日本为何能一跃而为强国?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归因于日本教育普及、实业发达者,有归因于日本实行立宪政治者,也有归因于日本人之尚武精神者。但不论哪一种看法,最后都不得不回到一点上,那就是日本是一个通过明治维新自上而下变革获得成功的国家。于是,中国人得到启示:日本既然能通过明治维新而成为地球一强国,中国为何就不能仿效它而获得成功呢?特别是留日学生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身临其境,目睹了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羡慕日本的发展,不少人坚信中国应当以日本为榜样,走改革道路。汤化龙(法政大学)就因为特别推崇日本近代政党创始人之一的大隈重信,竭力主张模仿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而被称为“大隈之迷信者”^⑪。更有甚者,一些留学生甚至“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⑫。

其三,革命派虽然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占了上风,但对一些关系到国之存亡的问题,如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而导致亡国,并没有给包括留日学生在内的广大国人以令人信服的解答,这就使不少留日学生对革命抱了怀疑和忧虑的心理。事实上,正像一些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所观察到的那样,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前,东京的留学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担心革命会引起外国瓜分中国而“主张通过逐步建立一个负责的政府来实现一场和平的革命”;他们所谓“和平的革命”其实就是改革,就是在财政、金融和行

政管理方面“实行二三根本改革”。^⑭

其四,当革命党人在东京等地乃至国内大力宣传革命思想的时候,清廷也在加紧制定和推行奖励留学生的政策,以吸引留学生支持其各项新政措施。这一做法对留日学生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903年8月,张之洞奉诏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成为奖励留学生有定章之始。1905年以后,考试奖励留学生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根据成绩的优劣,毕业留学生被授予举人、进士出身和各种实官。^⑮应考的留学生基本呈逐年增加之势。1905年只有14人应考,1906年43人,1907年42人,1908年127人,1909年285人,1910年560人,1911年526人。^⑯这中间绝大多数为留日学生,欧美留学生只占很少一部分。由于应考者必须是外国高等以上学校与外国人同班听讲之毕业生,加上正式考试前,还必须先于场外参加甄选,因此,各衙门咨送参加考试的留学生比实际应考的留学生要多很多。如1908年京外衙门咨到应考者178人,1909年383人,1910年721人,1911年587人。^⑰众多留学生积极参加毕业奖励考试,表明清政府笼络留学生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对清廷来说,派遣大批青年到异国留学,当然是希望他们学成归国后,为推行新政效力,为维护其统治服务。张之洞在鼓吹派遣留学的成效时,以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自西洋留学归国后对明治维新和日本崛起做出巨大贡献为证,说明当权者对留学生是寄予厚望的。虽然因不少留日学生受了革命思想影响而使清廷加强了戒备,以至于到清朝灭亡为止,在留学生中间并没有出现像伊藤、山县这样的被“用为将相”、掌握决策大权的人物,但有一点毕竟是事实,那就是清廷通过1905年以后的留学生毕业考试,至少使九百余名留学生进入了各级政府机构尤其是中央的各部门任职。^⑱如果加上单独考试的军事留学生,总数有千数百人之多。这当中,留日学生占了绝大多数。

当1905年前后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并进入各部门、各机构任职之时,正是新政大规模展开之际。政治方面,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东西洋政治,拉开了筹备立宪的序幕。教育方面,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新的教育行政制度逐步确立,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军事方面,随着1903年底练兵处的设立,新军编练在各省大规模展开。法制方面,也在逐步进行修改旧律、编纂新律等工作。所有这些变革都为归国留学生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遇与舞台,他们出于富国强国的目的,各挟其所学,积极投身其中。于是,晚清最后十年的历史剧,在相当程度上就由归国留日学生来导演了。

注释:

①参冈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卷,中华书局,1991年,第253页。

②《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76,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274页。

③梅里贝斯·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1年,第57页。

④《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1,第346页。

⑤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张文襄公全集》卷203,北平文华斋刊本,1928年,第6页。

⑥青柳笃恒这样描述当时中国人的留日热潮:“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引自[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37页)

⑦端方:《清平满汉畛域密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1页。

⑧[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533页。

⑨[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第540页。

⑩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14页。

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第208页。

⑫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8页。

⑬韩玉辰：《汤化龙的一生》，《湖北文史资料》第8辑，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4年，第64页。

⑭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第4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⑮〔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第725页。

⑯详细情况请阅本书附录《晚清留学生任用状况分析》一文。

⑰参阅黄福庆：《清末的留日政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集。

⑱参阅黄福庆：《清末的留日政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2集。

⑲参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46、584、590、593；《宣统政纪》卷3、10、13、36、42、44、54。

目 录

编辑人语	1
自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留日学生与清末筹备立宪	1
一 筹备立宪的重要推动力量	1
二 宪政编查馆的中坚	6
三 草拟筹备立宪法规	9
四 谘议局的活跃分子	20
五 资政院的主角	28
六 发起组织国会请愿运动	34
第二章 留日学生与清末教育改革	48
一 对新学制及教育宗旨的影响	48
二 参与教育行政改革与教育发展规划	52
三 创办新式学堂	60

四 师资结构的变化	63
五 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革新	71
六 学堂的重要管理者	75
第三章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军编练	84
一 规划全国新军编练	84
二 督导各地新军建设	90
三 新型军官群体	93
四 军事教育的骨干	98
五 筹划军事操演	103
第四章 留日学生与清末法制变革	112
一 译介东西方法律	113
二 编纂新律	116
三 与礼教派的斗争	119
四 参与司法体制变革	123
结束语	134
附录 晚清留学生任用状况分析	135
附表	156
一 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及参随人员出身表	156
二 宪政编查馆职员衔名及出身表	159
三 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姓名及出身表	162
四 资政院议员衔名及出身表	175
五 清末主要官办学堂管理人员出身表	183
六 清末新军统制及统领出身表	197